

非正式制度视角下企业社会创业的本土化行动逻辑

——冼夫人历史事迹的理论诠释与现实启示

麦映萍

广东海洋大学商学院 广东阳江

【摘要】企业社会创业强调企业将社会问题纳入战略目标，通过创新性资源整合实现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双重创造。然而，当前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实践大多停留于合规层面，如何激发企业社会创业的内生动力，仍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本土化问题。本文从非正式制度视角出发，在系统梳理企业社会创业相关研究、归纳关键行动维度的基础上，以《隋书·列女传·谯国夫人》及相关史料为核心文本进行结构性分析。研究发现，冼夫人历史行动在社会使命导向、长期主义与战略视野、跨部门协同能力以及社会资本与信任治理四个方面，与企业社会创业的关键行动逻辑具有较强的结构同构性。由此表明，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可以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资源，通过影响企业家的价值排序与认知框架，为企业社会创业由合规性责任走向战略性实践提供本土化的解释路径与行动参照。

【关键词】企业社会创业；非正式制度；冼夫人；本土化；行动逻辑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GD24XGL016）

【收稿日期】2025 年 11 月 16 日 **【出刊日期】**2025 年 12 月 23 日 **【DOI】**10.12208/j.jmba.20250050

The localized action logic of corporate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from an informal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and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s of Lady Xian's historical deeds

Yingping Mai

Business School,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Yangjiang, Guangdong

【Abstract】 Corporate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emphasizes that enterprises should integrate social issues into strategic objectives, achieving the dual creation of economic and social value through innovative resource integration. However, current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ractices in China largely remain at the compliance level, and how to stimulate the intrinsic motivation for corporate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remains a localized question that warrants deeper exploration. Drawing on an informal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on corporate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nd identifies its key action dimensions, then conducts a structural analysis of the *Biography of the Lady of Qiao State in the Book of Sui (Suishu Lienü Zhuan)* and related historical sources as core text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Lady Xian's historical actions exhibit strong structural isomorphism with the key action logic of corporate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cross four dimensions: social mission orientation, long-termism and strategic vision, cross-sector collaborative capacity, and social capital and trust governance. This suggests that loc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can function as informal institutional resources that, by shaping entrepreneurs' value hierarchies and cognitive frameworks, provide a localized explanatory pathway and action reference for the transition of corporate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from compliance-driven responsibility toward strategic practice.

【Keywords】 Corporate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Informal institutions; Lady Xian; Localization; Action logic

1 引言

随着现代社会治理格局不断演化，企业的功能

边界也在不断拓展。企业不再只是经济价值的创造者，也日益成为解决社会问题、参与公共价值创造

的重要力量。与以慈善捐赠、临时帮扶和形象维护为目的的传统企业社会责任（CSR）相比，企业社会创业（CSE）更强调企业将社会问题纳入战略与经营过程，通过创新性整合资源，在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持续创造社会价值^[1,2]。因此，CSE 为理解企业角色转型及市场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更具解释力的分析视角。实践中，单靠政策激励和资源条件并不足以使企业自然走向 CSE，更深层的动力在于企业家是否将社会目标内化为稳定的价值排序^[3]。这意味着从“合规性 CSR”迈向“战略性 CSE”，首先是企业家认知与价值排序重构问题，而不只是资源配置或制度约束问题。

企业家认知与价值排序并不是在真空中形成的，而是深受其所处制度环境的影响。其中，非正式制度主要通过文化价值观、社会规范与地方认同等因素，作用于行动主体对“什么值得做、为什么值得做”的价值判断^[4]。由此可见，要理解企业何以真正走向 CSE，不能只关注正式制度安排，还应重视本土文化资源对企业家认知与价值排序的深层影响。在此背景下，洗夫人（约 522-602）提供了一个值得讨论的本土分析对象。作为岭南历史人物，洗夫人长期在高度不确定的制度环境中推动族群整合、地方安定与秩序维系，其行动虽然并非现代企业行为，但在社会使命、长期投入、跨边界协同和规则化信任等方面，与 CSE 所要求的关键行动逻辑存在较强的可比性。更重要的是，洗夫人并未停留于单纯的历史叙事之中，其所代表的文化精神至今仍在粤西社会中具有较强的认同基础和规范影响力。因此，若将洗夫人精神视为一种具有现实影响力的非正式制度资源，并进一步考察其与 CSE 行动逻辑之间的结构关系，便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现有关于洗夫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历史叙事、地方文化传播和民俗象征建构等领域，其管理学价值尚缺乏系统阐释；与此同时，中国 CSE 研究在本土理论资源引入方面仍显不足，地方文化传统如何进入现代企业社会创业分析框架，也尚待展开。基于此，本文尝试回答三个问题：第一，洗夫人历史行动中有哪些可与 CSE 关键能力相对照的维度；第二，这些维度如何在非正式制度框架下为企业家的价值认知与行动选择提供解释支持；第三，这种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如何转化为当代企业社会创业的行动启示。

本文采用规范性理论分析与历史文本诠释相结合的方法。在文献处理上，本文以理论相关性为原则，选择能够直接支撑 CSE 行动逻辑分析的代表性研究进行分析。首先，对相关 CSE 研究进行归纳，提炼关键行动维度；其次，以《隋书·列女传·谯国夫人》为核心史料，结合《北史》《资治通鉴》及相关研究，对洗夫人历史行动进行分析；最后，从非正式制度影响认知与行为的逻辑出发，讨论其对当代企业社会创业的启示。

2 理论基础与分析维度

2.1 CSE 的概念内涵

CSE 的核心在于企业是否将社会问题转化为创业机会，并将社会目标嵌入战略核心，从而形成双重价值创造的持续机制^[1]。与传统 CSR 相比，CSE 更强调创业性、创新性与组织内部嵌入性；与独立社会企业相比，CSE 的行动主体仍是商业企业及其企业家，社会价值创造是在既有商业组织内部展开的。换言之，商业企业在保持市场定位的同时，将社会目标战略性地嵌入运营体系，而不必转变为独立的社会组织形态^[2]。因此，CSE 的推进本质上是企业家价值判断、战略选择与组织治理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非单纯的政策响应或资源驱动。

已有研究指出，社会使命是区分战略性 CSE 和表层性 CSR 的重要依据。王晶晶和郭新东（2015）^[5]认为，驱动企业从事 CSE 的动因包括社会需求、政策支持、利益回报、社会资源以及社会使命等多种因素，其中，社会使命作为内生性动机尤为关键。与其他动因相比，社会使命不仅影响企业能否在外部压力减弱后继续维持社会性投入，也决定社会目标能否真正进入战略排序，而不只是停留在声誉管理或短期合规层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使命的内化程度，构成了 CSE 能否从偶发的善举转变为持续战略实践的根本条件。

2.2 企业家在 CSE 中的关键作用

企业家是推动 CSE 的核心行动主体，其关键作用主要体现价值导向、时间取向与协同治理能力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上。

首先，价值导向决定社会目标能否真正进入企业战略。若企业家能够将社会使命内化为组织价值，企业便更有可能形成持续的社会创业动力^[6]。这种内化的关键，不只在于企业家个人的价值认同，还在于能否将其转化为组织层面的战略排序。只有当

社会目标真正进入资源配置和决策优先序列，而不只是停留于口头表态，CSE 才具备持续推进的内在条件。

进一步，时间取向影响企业是否愿意为回报周期长、短期收益不明显的社会议题持续投入。生态保护、乡村振兴、非遗传承等议题往往具有“短期见效慢、长期价值大”的特征，缺乏长期主义视野的企业家往往难以维持稳定承诺。这一点在 CSE 实践中尤为关键。社会创业的价值往往需要在数年乃至更长时间跨度内才能逐步显现，若企业家始终以短期财务表现作为主要参照，社会性投入便容易在短期绩效考核压力下被边缘化。

最后，协同治理能力决定企业能否在政府、社区、社会组织等异质主体之间形成有效合作。CSE 并非单一企业内部即可完成的活动，而是一个需要持续整合外部资源、跨越制度边界的过程。相关研究表明，跨部门联盟中的目标一致性、资源互补性与文化认同等匹配因素，会直接影响 CSE 的价值创造效果^[7]；而在金字塔底层等资源稀缺情境中，能否弥合社会资本鸿沟、建立可持续合作关系，往往又构成 CSE 落地的关键条件^[8]。

2.3 非正式制度对 CSE 的影响

社会创业活动始终嵌入具体的制度环境之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机制并不相同。正式制度主要通过调整外部约束条件，如法律定位、政策支持与资源配置规则，影响企业进入

社会创业领域的门槛与收益预期；非正式制度则更多借助文化价值观、地方认同和社会规范，作用于行动主体的认知框架，从根本上影响其对“什么值得做、为什么值得做”的价值判断^[4,9]。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正式制度改变的是行动的外部条件，非正式制度改变的是行动的内在逻辑。

在中国情境下，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尤其值得重视。当前，CSE 相关的正式制度仍存在法律定位不清、政策支持分散等问题^[10]，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文化与社会规范等非正式因素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更加突出。已有研究表明，儒家文化、地方社会规范与个体亲社会印记等非正式制度因素，会显著影响社会创业意愿、社会绩效与价值嵌入程度^[11]。许艳芳等（2021）^[12]基于制度逻辑理论的研究进一步指出，社会企业在市场逻辑与公益逻辑之间的策略选择，更深层地取决于创业者自身的价值认知框架，而这一框架正是在长期的文化浸润与非正式规范作用下逐渐形成的。由此可见，推动 CSE 本土化，不仅需要分析政策环境，也需要识别那些能够影响企业家公共价值认知的本土文化资源。

2.4 CSE 关键行动维度的归纳

为提炼 CSE 的关键行动维度，本文以理论相关性为原则，选取直接涉及 CSE 动因、价值创造、协同治理与制度嵌入的代表性研究，通过概念提取、跨文献合并与维度归纳，形成六项高频行动维度，如表 1 所示。

表 1 推动 CSE 的关键行动维度

维度	核心内涵	代表文献
社会使命导向	将社会目标内化为价值排序核心，主动识别社会问题并介入，而非被动回应外部压力	王晶晶、郭新东（2015）；杜晶晶、王晶晶（2011）；陈艳、金仁旻（2023）；吴俊余等（2024）
长期主义与战略视野	以更长时间周期理解社会问题的战略价值，在缺乏即时回报的情况下维持持续投入	云乐鑫等（2020）；许艳芳、朱春玲（2022）；袁彦鹏等（2020）；李杰茜等（2024）
跨部门协同能力	在利益异质、制度边界模糊的情境下，将不同主体组织起来围绕共同目标行动	葛笑春等（2020）；葛笑春等（2023）；万倩雯等（2019）；李惊涛、李玉昭（2024）；王玉宁、汪华林（2025）
社会资本与信任治理	以规则一贯性而非人情关系构建合作秩序，将信任从个人品格升级为制度安排	万倩雯等（2019）；卫田、万倩雯（2023）；彭伟等（2018）；吴肖梦（2013）
资源整合与拼凑能力	在资源约束情境下创造性地整合边缘资源，突破既有资源禀赋的限制	彭伟等（2018）；卫田、万倩雯（2023）；杜晶晶、王晶晶（2011）；葛笑春等（2020）
制度逻辑选择与二元平衡	在公益逻辑与市场逻辑之间构建稳定的优先排序，防止使命偏离	许艳芳、朱春玲（2022）；袁彦鹏等（2020）；葛建华、袁文昊（2025）；潘晶（2008）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将上述六个维度与洗夫人历史事迹进行初步比照后可以发现，并非所有维度都与其历史情境存在

真实对应。资源整合与拼凑能力预设了资源显著稀缺的行动情境^[3]，而洗夫人“部落十余万家”的资源禀赋并不符合这一前提；制度逻辑选择与二元平衡所涉及的市场逻辑与公益逻辑之间的张力^[4]，是现代商业组织特有的制度结构，在其历史情境中同样难以成立。由此可见，并非所有 CSE 维度都具有跨历史情境的普遍适用性，历史类比的价值在于揭示确实同构的部分，而非制造全面对应的幻觉。基于此，本文在后续分析中保留四个具有较强结构同构性的维度：社会使命导向、长期主义与战略视野、跨部门协同能力、社会资本与信任治理，以此构成分析洗夫人历史行动与 CSE 行动逻辑之间结构关系的理论框架。

3 洗夫人事迹作为 CSE 行动范本的理论提炼

洗夫人的核心事迹主要见于《隋书·列女传》卷八十《谯国夫人传》，结合《北史》《资治通鉴》及相关研究，本文以上节确立的四个维度为分析框架，对其历史行动进行系统考察。需要预先说明两点方法论立场。其一，本文不试图主张洗夫人的内心动机，史料无法直接证明动机的性质，本文考察的是可从史料中验证的行为模式，以及这些行为模式与 CSE 行动逻辑之间的结构同构性。其二，四个维度之间不是线性递进关系，而是相互支撑关系，每个维度的存在都强化了其他维度的效果，这种相互支撑关系同样可以从洗夫人的历史行动中找到具体例证。

3.1 社会使命导向

CSE 研究强调，社会使命导向并不只是口头表达公共关怀。更重要的是，当公共目标与局部利益发生冲突时，企业家是否仍愿意把社会目标放在较高位置，而不是把它降为声誉工具或短期合规手段^[3]。王晶晶和郭新东（2015）^[5]指出，真正推动 CSE 持续发展的，不是外部政策激励或利益诱导，而是企业家对社会问题的内生性认知。只有当社会目标进入稳定的价值排序，CSE 才可能超越短期回应，形成持续机制。这种内生性认知的形成，与企业家所经历的亲社会环境和文化熏陶密切相关^[15]。

如果按这一标准观察洗夫人，可以发现其历史行动具有较稳定的公共性取向。《隋书·列女传·谯国夫人》记载，梁末陈初岭南局势动荡时，洗夫人家族拥有较强地方实力，但她并未选择割据自立，而是持续指向归附、安定与整合。冯宝去世后，她仍能

“怀集百越，数州晏然”。这说明她维持区域秩序的行为具有相当独立性，并不只是依附于丈夫权力。关于番禺总管赵讷贪虐、洗夫人上书朝廷陈其不法，以及陈亡隋兴之际迎谒隋军等情节，《隋书》均有相关记载，《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七亦可与之互证。这些做法表明，在政治秩序尚未完全明朗时，她优先考虑的是区域稳定，而不是局部自利。由此可见，公共目标在洗夫人的决策排序中具有较高稳定性。这一点与 CSE 研究强调的社会使命内生性具有相通之处。换句话说，真正的社会创业并不是没有利益考量，而是在利益张力出现时，行动主体仍愿意持续赋予社会目标较高权重^[15]。只有如此，社会性实践才可能进入更长期的战略层面。

3.2 长期主义与战略视野

长期主义与战略视野是社会创业“能否长期做下去”的重要条件。许多社会议题，如生态修复、非遗活化和乡村振兴，往往难以在短期财务周期内显现回报。如果企业家缺乏超越即时回报的时间视野，社会创业行为就容易在短期成本压力或绩效考核中被边缘化。Dwivedi 和 Weerawardena（2018）^[6]也指出，具有长期价值取向的企业家，更能维持社会目标的战略地位，而不会轻易将其降为短期利益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长期主义不只是一种时间偏好，也是一种价值判断能力。它关乎行动者能否在尚未看到即时回报时，仍然确认社会问题的内在价值。

洗夫人晚年的若干历史行动，较能体现这一点。据《隋书·列女传·谯国夫人》和《北史·列女传》记载，仁寿年间，洗夫人年逾八旬仍奉诏巡抚岭南诸州。这说明，她的行动视野并未局限于个人生命周期内的得失，而是延伸至区域秩序的长期稳定。即便这些行为可能包含家族政治利益的考虑，也不妨碍其体现出长期主义特征。因为长期主义并不意味着没有利益考量，而在于行动者能否超出短期得失，在更长时间尺度上判断公共价值。这一点与 CSE 中的长期主义是相通的。它体现了一种超越财务周期的价值判断能力，也体现了在不确定回报期内持续投入的意愿。

3.3 跨部门协同能力

目标一致性、资源互补性与文化认同，是跨部门联盟得以运转的重要条件^[7]。其中，文化认同尤其关键，它既能减少合作摩擦，也有助于维持长期合作关系。万倩雯等（2019）^[8]对金字塔底层情境的研

究进一步表明,社会创业者在构建合作关系时,不能只依赖资源对接,还需要通过社区嵌入和规范塑造来弥合不同主体之间的社会资本鸿沟。只有这样,异质主体才可能真正围绕共同目标持续行动,而不只是形式上参与^[16]。由此来看,CSE跨部门协同的关键,不只是整合资源,而是在缺乏强制权威的情况下形成相对稳定的共同行动框架。

冼夫人所处的历史情境与此有一定可比性。她的影响力并不单纯来自正式行政权力,也来自她在俚人部族、汉族官僚体系与中央王朝之间不断进行联结与协调。冯冼联姻不仅是一种婚姻安排,也是一种跨族群、跨政治边界的整合方式。《隋书·列女传·谯国夫人》所载“使从民礼”等做法,也说明她并非只依赖个人威望维系秩序,而是在推动共同规范的形成。这样一来,合作关系便不只是建立在个人影响力之上,而有了更稳定的基础。

从这个角度看,冼夫人行动的启发在于,跨边界协同的关键,不只是把不同主体组织起来,而是让他们能够围绕共同目标持续行动。资源是否能够对接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各方能否形成共同目标和价值认同。这一点表明,冼夫人所体现的并不只是整合能力本身,更是一种在多元主体之间维持合作秩序的能力。

3.4 社会资本与信任治理

在社会创业研究中,社会资本和信任是合作得以启动的重要基础,但合作能否持续,并不只取决于关系网络本身,还取决于这种关系能否转化为更稳定的治理基础。彭伟等(2018)^[13]指出,社会创业组织在成长过程中,往往需要借助已有社会关系与资源拼凑来获得外部支持,但仅靠初始关系并不足以支撑长期发展,组织还需要不断积累合法性,形成更稳定的合作预期。社会创业行为之所以能够持续推进,不仅依赖创业者个人的责任感和公信力,也依赖其能否在合作过程中逐步建立起较为稳定的信任秩序。由此来看,社会创业实践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将建立在私人关系和个人信誉基础上的合作,转化为更具稳定性和可预期性的合作机制。

《隋书·列女传·谯国夫人》相关记载表明,冼夫人在治理中强调执法公正,不徇私情。她的信任治理并不是建立在血缘偏袒之上,而是建立在规则一致性之上。对外部主体来说,这种一致性意味着她的承诺具有可预期性,其行为标准不会因为关系

远近而随意变化。此外,她对后代的训诫以及对历代赐物的展示,也体现出一种把信任从个人行为扩展为家族秩序、从个体品格延伸为规则基础的倾向。从这个角度看,冼夫人行动的启发,不在于简单倡导“讲诚信”,而在于说明持续合作为什么需要稳定规则。只有当行为标准能够保持一致,建立在私人关系上的信任才可能逐步转化为更稳定的合作秩序^[8]。也正因为如此,信任治理并不是对协同关系的补充,而是其得以延续的基础条件。

综合以上四个维度可以看到,冼夫人历史事迹与CSE之间并非身份对应,而是在社会使命导向、长期主义、跨部门协同与规则化信任四个层面呈现出较强的行动逻辑可比性。前两个维度更多指向行动主体的价值取向与时间视野,后两个维度则更多体现其组织合作与维持秩序的能力。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地方历史文化资源才可能进入现代企业社会创业的解释框架。

4 冼夫人精神作为非正式制度资源的转化路径与行动启示

冼夫人精神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资源,能够从重构企业家对社会目标的价值认知,为跨部门合作提供初始认同基础,以及强化合作秩序的长期稳定预期等三个方面发挥正式制度难以替代的支撑作用。其中,价值认知的重构是前提,没有这一步,企业家不会主动进入CSE;认同基础的建立是启动条件,没有这一步,跨部门合作难以在初期形成共同语境;合作秩序的稳定则是持续条件,没有这一步,已经启动的合作也会因人员更迭或信任受损而中断。

4.1 将冼夫人精神嵌入企业家价值引导,推动社会目标进入战略排序

CSE能否真正启动,首先取决于企业家如何理解社会目标的意义。第三节分析表明,社会使命导向的关键不在于企业家是否了解CSE的概念,而在于公共目标能否在利益张力出现时仍然保持较高的决策权重。这种价值排序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企业家所处的文化环境与认知框架,而不只是政策激励或资源条件。冼夫人事迹所体现的公共性导向、长期视野与秩序意识,至今在粤西地区仍具有较强的认同基础,对本地企业家而言,这种文化资源能够将“要不要做社会创业”从单纯的利益计算,转化为“这样的事本来就值得做”的价值判断。当企业家以这种方式理解社会目标时,社会创业就

不再只是被动履责，而更可能成为一种具有内在认同的战略选择。因此，地方政府、高校和商会组织应将冼夫人精神有意识地嵌入企业家培训、创新创业课程和地方案例教学，以系统性地强化企业家对社会目标战略意义的理解，而不只是停留于文化宣传层面。

4.2 借助地方认同基础降低跨部门合作门槛，加快合作共识形成

价值认知的重构解决了“愿不愿做”的问题，但 CSE 的推进还需要解决“能不能把不同主体组织起来”的问题。乡村振兴、非遗活化、社区服务等议题，普遍需要企业、政府、社区与社会组织的多方参与，而这类合作在启动阶段往往面临陌生感强、沟通成本高、信任基础薄弱等障碍。第三节关于跨部门协同能力的分析已经表明，稳定合作的形成不只取决于资源能否对接，更取决于共同目标和价值认同能否尽快建立。对粤西地区而言，冼夫人信俗、年例活动以及由此形成的地方文化网络，提供了一种已有社会基础的认同资源。企业在推进相关 CSE 项目时，若能与此类地方认同形成适度联系，便能有效降低合作初期的不确定性，在异质主体之间更快建立初始信任。地方政府、基层组织和社会服务平台应主动借助这一文化网络，搭建企业、社区与社会组织之间的接触与协商平台，将文化认同转化为合作启动的制度性支撑。

4.3 通过地方文化认同培育强化合作秩序的长期稳定预期，防止合作中断

合作能否启动固然重要，但更关键的问题是合作能否持续。第三节关于社会资本与信任治理的分析表明，建立在熟人关系和私人承诺之上的合作，容易因人员变动、资源波动或信任受损而中断；只有当合作建立在稳定的规则认同之上，才能形成跨越人员更迭的持续秩序。冼夫人精神所体现的，不只是个体层面的公正品格，更是一种对规则、公平与秩序的基本认同，这种认同具有独立于特定个人的稳定性。因此，地方政府、基层组织和项目发起方不只需要关注制度安排本身，更需要将合作秩序的文化认同培育视为 CSE 持续推进的基础性工作。通过地方叙事、公共传播和项目共同体建设，将冼夫人精神中所包含的公平、守约与秩序意识，转化为合作各方共同接受的行为期待，使合作秩序建立在文化认同而非单纯的个人关系或临时协议之上。

4.4 以长期主义视野应对社会创业的回报周期压力

上述三个路径聚焦于合作关系的建立与维持，但 CSE 的持续推进还面临另一个关键挑战：如何在缺乏即时财务回报的情况下维持企业家的长期承诺。第三节关于长期主义与战略视野的分析表明，乡村振兴、生态保护、非遗传承等议题的内在特点决定了它们必然要求超越单个财务周期的投入，而缺乏长期主义视野的企业家，往往在第一个绩效考核压力出现时就会退出。冼夫人晚年仍奉诏巡抚、推动崖州建置的历史行动，展示了一种超越个人收益边界的时间承诺，正是这种承诺，使区域秩序的建构得以延续数代。对当代企业家而言，这意味着需要将 CSE 的价值评估框架从短期财务指标，扩展至社会影响力、品牌积累与制度性信任等长周期维度。地方政府和行业组织在设计 CSE 支持机制时，也应相应调整评估标准，为具有长期主义取向的 CSE 实践提供更稳定的外部预期，而不只是以短期可见成效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依据。

5 结语

本文从非正式制度视角出发，尝试将冼夫人历史事迹引入企业社会创业的本土化讨论。通过对 CSE 相关文献的归纳和历史文本的结构分析，本文发现，冼夫人历史行动在社会使命导向、长期主义与战略视野、跨部门协同能力以及社会资本与信任治理四个方面，与 CSE 的关键行动逻辑具有较强的结构同构性。这说明，中国本土历史文化资源并不只是文化象征，也可以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资源进入企业社会创业的解释框架，并在价值判断、合作启动和秩序维持等方面发挥作用。

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本文通过将 CSE 行动维度与历史文本进行结构性比照，尝试为地方文化资源进入管理学分析提供一种可行思路。第二，本文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表明，从 CSR 走向 CSE 并不只是战略选择问题，也涉及企业家认知框架和价值基础的重构，而本土文化资源在这一过程中可能发挥重要作用。当然，本文仍属于理论探索。历史行动逻辑与现代企业行为之间的关系，仍有待后续案例研究、问卷调查或比较研究进一步检验。未来若能在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资源和不同企业类型之间展开经验分析，将有助于推动中国企业社会创业研究形成更扎实的本土理论积累。

参考文献

- [1] Austin J, Reficco E. Corporate social entrepreneurship[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ot-for-Profit Law*, 2009, 11(1): 86-91.
- [2] Dwivedi A, Weerawardena J. Conceptualizing and operationalizing the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construct[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8, 86: 32-40.
- [3] North D C.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4] 陈艳, 金仁旻. 印记视角下商业企业社会福利逻辑嵌入研究[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2023, 21(4): 5-16.
- [5] 陈咏昶, 王亚男, 张楠迪扬. 儒家文化与社会企业绩效: 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J]. *管理世界*, 2024, 40(2): 65-82.
- [6] 杜晶晶, 王晶晶. 企业社会创业及其精神培育[J]. *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5): 55-57.
- [7] 葛建华, 袁文昊. 混合型组织研究: 主题、整合与展望[J]. *南开管理评论*, 2025, 28(3): 197-208.
- [8] 葛笑春, 翟云杰, 王宜敏, 等. 跨部门联盟的匹配因素与公司社会创业价值创造的关系研究[J]. *研究与发展管理*, 2020, 32(3): 25-35.
- [9] 刘志阳, 许莉萍. 制度情境与社会创业: 研究述评与未来展望[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22, 44(2): 3-20.
- [10] 彭伟, 于小进, 郑庆龄, 等. 资源拼凑、组织合法性与社会创业企业成长——基于扎根理论的多案例研究[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8, 40(12): 55-70.
- [11] 万倩雯, 卫田, 刘杰. 弥合社会资本鸿沟: 构建企业社会创业家与金字塔底层个体间的合作关系——基于 LZ 农村电商项目的单案例研究[J]. *管理世界*, 2019, 35(5): 179-196.
- [12] 王晶晶, 郭新东. 企业社会创业动机的探索性研究: 基于三家企业的案例分析[J]. *管理案例研究与评论*, 2015, 8(4): 338-348.
- [13] 许艳芳, 朱春玲. 社会价值、经济价值与社会企业创业策略的选择——基于制度逻辑理论的案例研究[J]. *管理案例研究与评论*, 2021, 14(1): 67-80.
- [14] 袁彦鹏, 鞠芳辉, 刘艳彬. 二元价值平衡与社会企业创业策略——基于创业者身份视角的多案例研究[J]. *研究与发展管理*, 2020, 32(3): 36-49.
- [15] 云乐鑫, 周兴昊, 石晓. 社会责任与社会创业比较研究——以景芝酒业为例[J]. *管理案例研究与评论*, 2020, 13(6): 599-608.
- [16] 郑又瑞. 社会企业作为公益供给的制度保障研究[J]. *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37(2): 33-40.

版权声明: ©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